

学术 视点

保护古籍，传承文明

——委员、学者谈中华古籍资源库建设发展与中华古籍保护发展

本报记者 张丽

古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信息化技术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推动古籍数字化,也成为近年来的热点。国家图书馆从200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将珍贵特色馆藏进行数字化,陆续建成一些专题资源库,直至2016年,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阶段成果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正式开通运行,在线发布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影像,其中包括《赵城金藏》、敦煌遗书等珍本秘籍,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得到共享与普及。本报记者就中华古籍资源库建设发展与中华古籍保护传承等话题,采访了部分委员、专家与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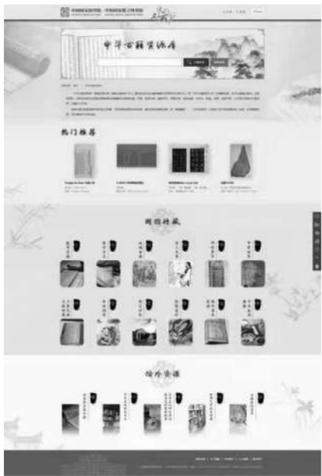
数字化让古籍文献“活起来”

上承宋元以来历代皇家珍藏,旁搜明清以降南北藏书家毕生之积累,又经历代馆员努力购求,益以社会各界无私捐赠……国家图书馆形成了起于殷商、涵盖中外的宏富馆藏。截至2020年底,馆藏古籍特藏文献约300万册(件)。

如何让这些承载着深厚传统文化的古籍从尘封中“活”起来,是近年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课题,拥有丰富古籍资源的国家图书馆更不例外。古籍数字化,是一个重要方式与途径。目前,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资源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以及天津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等馆外古籍资源,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洋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海外征集古籍资源,总量约10万种。

“中华古籍资源库作为国内标杆性的古籍影像数据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史学者利用古籍文献的方式。”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说。他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参加《四库存目丛书》编纂时的情景,当时想翻阅国家图书馆或其他图书馆的古籍善本,现场查阅、复印几乎是唯一途径,而现在只需在计算机上点击鼠标就能看到众多古籍善本图像,两相对比,简直有天壤之别。目前杜泽逊带领团队在做《十三经注疏汇校》等项目,对中华古籍资源库多有利用。

对于古典文学专业出身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高虹飞来说,中华古籍资源库是她撰写博士论文与博士后报告的一件“利器”。她感慨道,“在图书馆,为避免污损古籍,我们通常不敢离书叶太近。



中华古籍资源库网页



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善本古籍影像,其中包括《赵城金藏》、敦煌遗书等珍本秘籍。

还有一些单位每次仅向读者出借一部馆藏古籍,读者阅毕归还方可调阅下一部,这样就无法实现馆藏古籍的对勘。而利用资源库,读者不仅省却了交通出行、进馆安检、办理借阅手续、等待古籍提取的时间,还可以轻松实现古籍对勘,更可尽情地放大图像、局部截图,从而更加仔细地考察刻本的版式与字体风格。”

喜马拉雅平台上日前策划了一门历史类音频课程,涉及很多古籍资料,该平台制作人尹琨在校对授课讲稿时,发现内容涉及不同版本间的异文,这就需要核对原书,而中华古籍资源库的利用则给他带来很大便利,“让脱离高校古籍资源的相关从业者也能随时利用古籍资源工作和学习,希望能惠及更多普通人”。

近年来,中华古籍资源库也在不断进步,“它所收录的古籍善本影像数量在不断增加,它的系统易用性、访问速度也有较为明显提高。特别是今年以来,还取消了访问时的登录要求,改为无须读者注册就可直接浏览,在开放程度及访问便捷性方面走在了国内同类数据库的前面。”作为“忠实用户”的杜泽逊谈到使用体验时可谓赞不绝口,他希望中华古籍资源库在未来能加强整合各子库资源,持续在访问速度、检索功能、系统易用性等方面下功夫优化,同时也加强对地方各级图书馆古籍资源库建设的指导,推动古籍数字化事业不断向前。

古籍数字化催生学术新成果

20余年,国家图书馆秉持开放共享的理念,通过积极推进古籍数字化工作,将大量的古籍数字化成果以便捷的方式服务于广大读者和社会公众,真正践行了国家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使命。国家图书馆还组织了5次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活动,联合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等39家古籍收藏单位在线开放共享古籍数字资源超过2.2万部(件)。

足不出户查找和浏览古籍资源,成为数字文献利用方式的重要特色与优势。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不少疑问,比如,越来越便捷的文献利用方式,会不会

影响读书效果?长年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研究的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教授陈力认为这并不值得忧虑,“对于严肃的研究者来说,文献利用方式并不影响读书效果,不管是传统查阅还是数字化查阅,都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或浏览,比如有时查阅资料仅仅就是为了找到一句话或一段话,只需要略读就可以了。”

古籍数字化,不仅影响了文献利用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关领域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流行谈数字人文,利用现代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度加工,比如通过大数据处理、信息挖掘分析等,收获一些新知识、新成果。较早的比如通过数据分析《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语言风格变化等,来判断前后作者是否一致。又比如,通过数据分析某地区某时段的自然灾害变化,发现可能存在的某些规律。而这些单靠人工是很难做到的。”

探索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多元途径

古籍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古籍工作人才的培养。以国家图书馆古籍工作人才培养为例,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副馆长陈红彦介绍,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工作人员涉及不同专业,博士硕士占半数以上,不少已经是研究馆员,在相关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事业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她表示,“一批既懂古籍、懂古籍业务又懂古籍用户需求同时又了解新技术、具有创新意识”的古籍人,正从传统走向未来,一个在传统基础上充满活力被社会认可的古籍文献馆藏体系、服务体系为现实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着保障。”

古籍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涉及采访、编目、阅览接待、典藏、保护、修复、研究文化推广(展览、讲座)、数字化、研究等;做好古籍工作需要实践的历练、经验的积累和老师的指引。金石专家冀亚平曾经有个说法,没有5000种编目的实践,不能说会金石拓片的编目。在陈红彦看来,国家图书馆有一批古籍鉴定的专家,实际上也得益于丰富的馆藏与见多识广的经验积累。

她认为,“以老带新的方式,打造老中青结合的人才队伍,保障人才梯队的相对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启动以前,古籍修复人才奇缺,近几年通过培训班、师徒间传习、学历教育三驾马车的同时发力,修复师数量已经增长10倍。”

得益于112年不断的师徒传承,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于2008年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013年杜伟生成为这个代表性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文化和旅游部的推动下,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成立,并在全国带动了30余家传习所共同培养人才。

跨界跨行业的联合,也为古籍工作人员的培养,提供了新途径。陈红彦表示,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员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等学校导师、行业导师的人数也在增加。他们在教导学生的同时,不断总结新知识新经验,也提升了自己。“此外还为海内外兄弟单位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支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埃默雷图书馆,派送专业人员整理编目其馆藏,为中文古籍在海外的整理与利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开阔了视野。”陈红彦说。

《中国古籍装具》《文献保护中英双解词语手册》《古籍数字化规范数据采集实践》等专著填补了行业空白,《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引起敦煌学界热烈反响,《善本掌故》普及文化、自主研发的脱酸设备脱酸液让150年间的酸化文献获得新生成为可能……近年来,国家图书馆跟踪学术前沿,在科研中成长并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古籍鉴定、编目、库房管理、修复保护、数字化、文化推广领域成就了一批批复合型人才。“结合馆藏各类文献,中外文古籍、甲骨、石刻拓片、敦煌西域文献、古旧地图、样式雷、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近现代名家手稿及革命文献的整理研究,开发利用方面均有建树,基础业务与学术研究有机融合,提升了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成果丰硕。”陈红彦谈道,仅近5年就主持有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课题、1项科技支撑项目、3项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与国别类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与23项馆级课题;研制发布多项国家标准和部颁标准、专利;出版40余部专著、发表论文近300篇等。

国家图书馆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正式启动

日前,国家图书馆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正式启动。本次评选图书范围为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以版权页记载时间为准),由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出版机构在国内正式出版、公开发行(包括限国内发行)的汉文图书,不包括重印本和已获过文津图书奖的再版图书。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3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的人文与科学素养的非虚构类(少儿类除外)普及性图书。评委会将通过推荐、初评、终评等程序,选出获奖图书20种、推荐图书60种(均可空缺)。荐书时间持续至2022年1月5日。

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自2004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16届。文津图书奖评选出来的优秀图书将通过全国性的巡展、“文津读书沙龙”系列讲座巡讲、文津书架等丰富的阅读活动与读者朋友们见面,让大家在参与文津图书奖丰富的活动中体验阅读的快乐,不断充实自我、感悟书香魅力。(张丽)

谈文 论艺

大约1万多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开始尝试将采集而来的普通野生稻种加以种植和利用,由此迈出了从洞穴走向旷野的步伐。从洞穴到旷野,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脚印,发现于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在国家博物馆“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展厅,跟随上山人的“脚印”,我们仿佛看见一条通向文明的道路。

一粒米

长3.732毫米、粒宽1.667毫米、粒厚1.723毫米,展厅中央,一粒小小的碳化稻米被陈列在醒目的位置。它出土于浙江省浦江上山遗址,距今约11000-8500年。

经专家分析研究,这粒碳化稻米属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上山遗址早期文化地层中出土的碳化稻米,是目前通过系统筛选法在层位清晰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稻米。同时,在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永康湖西遗址均发现了数量丰富的上山文化的碳化稻米,表明在上山文化中晚期水稻的食用更加普遍。

水稻栽培、收割,加工脱壳以及食用证据,都一一被发现。比如展览中的磨盘、磨石,磨盘平面近似圆角方形,边缘不平整,显得非常厚重。使用面对角有一条隆起的脊线,两侧稍稍低一些,说明使用痕迹明显。磨盘、磨石的大量使用,反映了上山时期农业加工的发达繁荣。

不仅有香喷喷的稻米食用,上山人还有酒喝。一只浙江省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彩陶壶颇为特别,考古专家在壶内的残余物中发现了一种加热产生的糊化淀粉,经检测研究,发现残留物与低温发酵的损伤特征相符,而低温发酵是酿酒的基本原理。因此,9000年前的上山人可能已经掌握酿酒技术,而这只陶壶就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酒器。

一抹红

展览中数量最多的展品要数陶器。大口盆、平底盘、圈足盘、双耳罐、壶、钵、杯、碗,品种繁多。这是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在陶片的断面上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陶器胎土中有稻壳、稻叶、稻穗和植物茎秆留下的痕迹。这说明1万年前的上山人已经有意识地在食用稻米之后,将稻的残余物混合在陶土中制陶器,有了陶器,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可以想象,上山人使用它们进行饮食、劳作增添了不少便利。

除了技艺之外,上山人对美的追求也令人惊叹。上山文化彩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彩陶,陶胎表面是红色的陶衣,里面则是乳白色的涂彩层。在桥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片上,还可以看到两个完整图案,其中一个是一周辐射短线的圆形,好像一个小太阳,不知是否与上山人的信仰或崇拜有关?

陶器伴随着上山人的物质生活,也烙印下他们的精神世界。那一抹红色穿越万年时光与我们面对面,依然鲜艳、浓烈,让人不得不佩服先民的智慧。



上山文化时期的陶器

观国家博物馆「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

本报记者 谢颖

一粒米开启的文明之路

观国家博物馆「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

一群人

要想走出洞穴,到旷野生存,除了有采集狩猎、种植稻米、制作陶器等“十八般武艺”外,上山人还需要一项重要技能——建造房屋。目前在上山遗址中,普遍发现了建造房屋的证据,包括干栏式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式房屋。

有了房屋,人类终于告别了数百万年的原始生活。不仅如此,在嵊州小黄山、永康湖西、义乌桥头等上山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环境的遗迹,小黄山遗址还发现多条壕沟相互打破。环境是抵御洪水、猛兽侵袭,为聚落内部提供防护的主要设施,因此聚落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环境的出现。这也充分显示出上山人定居生活从萌芽到壮大的状态。

有居所、有食物,走出洞穴的上山人生活有了着落。这一群人辛勤耕耘,迎求收获,得以繁衍、生息,无怪乎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将上山文化遗址称赞为“远古中华第一村”。

上山文化是“农业”“定居”在东亚社会里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最早实证,而上山文化遗址群在钱塘江流域的聚落性分布,并向周边地区扩散发展的态势,呈现出农耕定居文明的最新景观,更展现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稻作农业社会初创和形成期的文明模式,以及此后延续数千年发展的文明基因。上山文化就像一颗“启明星”,照亮了中华大地绵延不绝的文明之路。

信息 集萃

作家出版社推出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

日前,学者型作家何辉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共分8部,分别是《沉重的黄袍》《大地棋局》《天下布武》《鏖战洺州》《王国的命运》《内廷的烛影》《笔与剑》《江山多娇》。从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开始,至公元976年赵匡胤在开封皇宫中神秘去世为止,该书以赵匡胤致力于统一中国的内容为叙事核心。陈桥兵变、金匱之盟、宋初平定内乱、挫败契丹偷袭、杯酒释兵权、吞并荆湖、灭后蜀、破南汉、征南唐、伐北汉等重大历史事件被作者丰沛的笔墨精心勾连,绘成一幅宏大壮观、瑰丽壮阔的全景画。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引用了丰富的诏令、书札、诗文,不少是从珍稀古籍中挖掘、摘引出来的。

同时,作品在历史的褶皱中深挖人物幽微的内心世界,描绘宋代市民的日常生活与风物人情,思考个人际遇与历史或偶然或必然的牵连,散发着文化的意趣与人性的温度。(谢颖)

中泰创意产业论坛在线上举办

11月12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泰国创意经济局共同主办的“亚洲文化语境下的设计:中泰创意产业论坛”在线上举办。

本次论坛主题为“亚洲文化语境下的设计”,集合中、泰两国首饰设计的多位专家、学者、设计师,围绕“首饰设计教育”“设计师品牌价值”“传统思想与当代设计”三个方面展开主题演讲及对话。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吕敬人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下,设计应当成为应对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首饰产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发展展示了前景,也提示了未来艺术与设计发展的新方向。他指出,首饰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在今天更体现着前沿设计与科技的力量。

此次论坛是“山水相‘链’:中国—东盟首饰艺术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展览将呈现来自中国和中东十国10余位首饰艺术家,采用实物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展示风格各异的数量百件首饰艺术作品。(杨雪)

“摄影艺术与现代艺术体系高端论坛”在线上举行

日前,由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当代中国艺术体系研究”(18ZD03)课题组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摄影家》杂志社、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与数字艺术研究所等协办的“摄影艺术与现代艺术体系高端论坛”在线上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李树峰,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长祝东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庞井君以及“当代中国艺术体系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李心峰和来自国内外的摄影艺术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参加了论坛。

与会学者从摄影艺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等视角解答了当前摄影艺术体系、摄影学术体系、摄影艺术学科建设中的热点、难点、难点问题,为摄影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艺术管理理论、美学、哲学研究等提供了有价值的真知灼见。(郭海瑾)